·纪念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45周年专稿·

做好国土这篇大文章

——缅怀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创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

柳忠勤



2000年7月5日，为于光远先生摄影，题为“时髦老人”

于光远（1975.7.5—2013.9.26），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获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荣誉称号。

于光远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学者”。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一直走在前沿，率先提出了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并参与了中央的许多重要决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1978年，时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于光远先生主持起草了被誉为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报告的邓小平同志那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1年，于光远先生在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并提出了“大国土”理论。

我和先生相识于1994年的5月16日，那天，《国土报》在北京饭店召开创刊座谈会，下午3时许，刚刚离任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时任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会长、《国土报》编委会主任的王先进同志对我说：“忠勤，于老来了，快去接一下。”我抬眼望去，只见一位老者正健步走出电梯，我急忙趋前问候，把光远先生迎进会议室。记得那天先生不仅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而且还同意出任报纸编委会名誉主任。之后不久，又在《国土报》上开辟了于光远专栏——《散文与国土》。

二十年的频繁交往，使我深深感受到，光远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



1994 年 5 月，在《国土报》创刊座谈会上初识光远先生

还是一位宽厚可亲的长辈，睿智、博学的师长，不仅先生的谆谆教诲使我受益匪浅，而且还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

值此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成立 45 周年之际，我把自己对先生的见闻和感悟略作整理，拙笔难以成彩，但愿这篇文章能为那些崇敬他的以及对他还不太了解的青年读者撩开一层神秘的面纱，从近处知晓这位老共产党员、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是主张“大国土”的

“我是主张‘大国土’的！”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于光远先生多次对我说过的话。

1990 年 3 月，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会在北京饭店宣告成立，我担任常务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在 3 月 5 日的成立大会上，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第一副会长的王先进同志讲话说：“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的‘大国土’理论，国土资源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因此，我们促进会的道路今后会越走越宽。”

从那时起，于光远先生和于光远先生的“大国土”理论开始走进我的工作和生活。其后不久，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会改名为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王先进担任会长，于光远、杜润生等担任国土资源开发促进会的高级顾问，先生经常应邀参加我们的活动，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1994 年，促进会创办了《国土报》，我们为于光远先生开设了“国土与散文”栏目，每周都要发表先生关于国土经济方面的散文、随笔。

1997 年，应于光远、杜润生两位先生的邀请，我又兼任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的秘书长，同时服务于两个国家社会组织。

由于我们在一起便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为了从理论上明确学会的努力方向，同时，也使国人对“大国土”理论有个进一步的了解，我曾多次到光远先生家中，就大国土理论的内涵、外延，以及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的发展等有关问题专门向他请教。

于光远对“大国土”的话题兴趣浓烈，每次交流先生总是精神矍铄、笑声朗朗：“谈这方面的话题，我总是兴致勃勃的。我确实主张‘大国土’的观点，这一概念是我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成立时提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土是立国之本、立国之基。我们所说的国土，是指受一国主权管辖的区域，广义包括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和它们的下层和上空，当然，深度和高度都有一定限制。还包括大陆架，同时，还不能忘记“公土”——公海，以及世界公共部分的如南极大陆等，它们虽然不在我们的主权管辖范围内，但它们也有我们的一份。

1981 年，我还就国土开发问题提出过 12 对关系、24 个方面：平原和山地，陆地和水面、大陆和海洋，大块和零星，地上和地下、已开发和未开发，易利用和难利用，南部和北部，东部和西部，乡村和城市，国土和公土，局部和整体。目的就是想让人们全面重视国土资源的开发。同时，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比方对零星土地利用，我就提出了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上上下下许多同志的注意。

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国土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国土经济学的研究放到一个重要位置，切实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于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十多年来，在于光远、杜润生、王先进、张怀西四任理事长领导下，经过四届理事会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组织了一大批从事国土经济研究与国土资源开发保护工作相关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按照“大国土”的理论对国土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国土空间的格局优化，国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



根据于光远先生生前愿望，2014 年 1 月，先生夫人孟苏女士（左）把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纲手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提升了服务社会、服务基层的品位和质量，更使本会的工作迈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因此，应当说，我们是于光远“大国土”理论的主要受益者。

2009 年 9 月，长期关注资源环境建设，为把节约资源列入基本国策作出重要贡献的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被选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上任伊始，张怀西就提出，要坚持于光远先生的“大国土”理论，要“站在国家安全高度研究国土经济学”，要把国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放在一起，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进行研究与实践。张怀西同志带领我们到过许多地方，广为宣传光远先生的“大国土”理论，领导我们把学会的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11 年，本会创建的低碳国土实验区列入国务院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2012 年，本会的学术研究成果“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写进了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于光远先生的“大国土”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

深入研究。尤其是 2001 年以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的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全国低碳国土实验区、全国国土空间优化发展实验区共建工程，推动了科



2003 年 12 月 18 日，于光远、杜润生出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中心举办的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第三次工作会议

“这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

国人皆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人有所不知的是，被誉为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报告的邓小平同志那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由光远先生主持起草的。

有一天，我去看望光远先生，从谈话中得知，他珍藏着一份邓小平同志亲笔拟就的那篇讲话的提纲手稿，便想饱饱眼福。不一会儿，光远先生夫人孟苏阿姨从内室拿出几页白纸，我接在手里一看，只见这三页 16 开白纸已微微发黄，邓小平同志提纲是用铅笔写的，字体潇洒流畅。我数了数，提纲约 500 字，共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首页左侧“对会议评价”一句被勾到了最前面。笔者认为，这应当是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由于这篇文章是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国内外对于它的产生有过许多不同说法，鉴于此，我请光远先生谈谈这篇文章的起草经过。光远先生说，小平同志的讲话稿是在 1978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成的，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



1996 年 5 月 30 日，于光远在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上发言

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作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因此，讲话稿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的体现。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平同志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耀邦说好，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当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光远同志说，那时，国务院研究室直接对邓小平同志负责，我们经常见面。小平同志把提纲交给我们的时候，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因此，我们赶忙找到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清等执笔起草，两天后初稿形成，我看了看还可以，就送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很快便召集耀邦、我和林涧青等同志到北京后海他的家中进行研究，记得当时我坐在小平对面，耀邦坐在旁边，我们一字一句地边念边修改，用了整整四个上午，最后小平说，就这样子，拿出去。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这篇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一直留在我这里。

看过原件，听过光远先生讲述这份手稿来历，我对这份手稿立刻产生了敬畏之感。记得当时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双面夹子，抽出里面的文件，把这厚重的 3 页纸放进去交还孟阿姨，建议她好好保存。后来，听说中央档案馆曾经来找光远先生征集这份手稿，光远先生没有给，理由还是放在民间好，因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这是他父亲留在民间的唯一的一份手稿。

愿寿长 80 万小时

光远先生惜时如金。二十年间，我每次到他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兼书房，从未见他闲着。前些年，坐在办公桌前伏案写作，后些年，坐在电脑跟前录制文章，再后些年，他坐在电脑跟前，用筷子指着电脑，秘书帮助录制。

1988 年 5 月，于光远曾将自己的 38 篇短文抄寄胡耀邦。后与其他短文合在一起出了一本印刷精美的书叫《碎思录》，其中有篇文章的题目叫“愿寿长 80 万小时。”我曾就此向他讨教：“为何以小时论计？”光远先生说，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以岁月计失之过粗，以分秒计失之过细。以小时计最为适宜。80 万小时——91 岁又 95 天，尚能做点工作，就算很理想了。光远先生的观点得到了胡耀邦先生的赞赏，录杜甫诗句“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回赠。

按照常人的观念来衡量，生活中的于光远先生确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有位朋友发言说：“我和于光远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好朋友。反右期间，我被打成右派到山东工作 20 年，落实政策去看望于光远，一见面，光远先生就说，你先看材料，我正在写文章。写完放下笔就谈工作，连句寒暄的话都没有。”笔者也曾见到过这种场面，某次开会，光远先生进门坐下就改文章，有位老朋友热情地过来打招呼：“于光远先生你好！”连叫三声，不得回答。这位先生以为他没听见，走近又问一声，光远先生头也没抬：“等下等下，我正在改文章！”弄得那位先生好不尴尬，去不是，留也不是。直到改完文章，光远先生才向那位先生打招呼、道歉。如上两件小事，乍听起来，似乎于光远先生的架子很大，不易接近，其实不然，就笔者所接触的不少大人物而言，于光远是相当平易近人的一位，只不过他不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人情世故上罢了。

谈起于光远的工作效率，知情者都知道，那真是高得惊人。应邀出席各种会议于他是常事，但仅仅陪会光远先生是从来不干的。不久前有家杂志举办创刊周年座谈会，邀请于光远参加。当时对方的电话打来时，我正在座。开始，他基本上是婉拒了。后来，当他接完电话，我们一起谈到了与这个单位合作办某件事的可能性时，先生便说，既然有目的而去，那就参加一下吧！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也都是即席的。虽是即席讲话，但每每思路清晰，娓娓道来，闪烁着一朵朵智慧的火花，会后稍作整理，便是一篇好文章。对此，光远先生曾经无不幽默地对我说，这些年岁月大了，搞调查研究不太方便了。因此，大部头的文章写不出来。但散碎的东西却写了不少，不过，这些散碎的文章有不少都是会议的“结晶”。



2007 年 2 月 2 日，春节，柳忠勤和于光远先生在一起

怎么，你不愿做我的忘年交？

1997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于老又一次和我谈起“大国土”问题，谈兴正浓时，先生突然说：“忠勤，咱们是忘年交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我何德何能，先生德高望重，我怎么敢做他的忘年交呢？一时语塞。“怎么，你不愿做我的忘年交吗？”我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急忙解释，“哪里哪里，不是不愿意，是不敢啊！”“这有什么不敢呢，咱们就是忘年交嘛！”于是，我真的成了光远先生的忘年之交。

我和于光远先生的交往频繁而又随意，去看他也极少打电话预约。对于我的到来和问候，于老往往报以点头致意，然后继续他的写作，直至思绪告一段落，才转过来和我交谈，但往往谈起来又没个结尾，尤其是涉及国土方面的话题。好几次到了中午，夫人孟苏阿姨从里屋走出来说：“你让人家忠勤走吧，要开饭了呢！”“不行不行，我还没有说完呢！”于是，话题继续。谈者津津乐道，听者有滋有味。光远同志厚重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使他谈话充满哲理和智慧。每回都感到受益匪浅，每次都后悔没带录音机来。

1999 年春节前的一天，学会小城镇专业委员会谢扬秘书长约我到万寿宾馆节前聚会，这是一个保留节目，每年都要组织，光远先生和杜润生、吴明瑜、朱厚泽、李锐、刘堪每年都会参加，我作为学会代表也常常获邀出席。那年，司机李师傅回家过春节，我没有车坐，加上那天下午我的心脏有些不舒服，于是就想搭于老的车赴万寿宾馆。到了光远先生家不一会儿，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来给先生拜年，同时向他请教“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题拉开，一会儿就到了四点多。先生说：“忠勤你看，我这里有客人，你代表我参加今晚上的聚会吧！”看着此情此景，先生确实不好走开，我说，“我去可以，但是怎么敢代表您呢？”先生一脸严肃：“怎么不可以？咱们是忘年交啊！”我扑哧笑啦，心说这有关系吗！但也不好再说别的，于是道别先生，乘公交、换地铁、再步行参会，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回家，浑身都爽快，心脏的不适早就不知哪里去了。事后我给好多位朋友谈起此事的体会：话疗可以治病，尤其是可以治心脏病。

小孟快来，忠勤要绑架我啦！

1996 年，是我们活动较为频繁的一年，五月的一个月内，就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四次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战略研讨会”。那是为了针对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而举办的高级别论坛。会议定在 5 月 30 日召开。会前，我来到于光远先生家，邀请他参加会议并发言。

按照老时间，我下午三点半准时来到他的书房兼客厅，只见先生已经在伏案写作，听见门响，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伏案。差不多过了十来分钟，才又抬起头来，冲我歉然一笑：“忠勤，又有什么事儿？”我把请柬呈上，同时恳请他在会议上发言。

不巧的是，那几天先生要赶一本书稿，因此不太想参加我们的会议，于是问：“非常希望我参加吗？”“非常希望！”“不参加不行吗？”仗着先生和我的“忘年交情”，我又跟了一句：“不参加不行！”



1998 年 12 月 16 日，在史家胡同于光远先生家中



2005 年 7 月 3 日，作者与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的 6 位副秘书长参加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并与光远先生合影

“小孟快来，忠勤要绑架我啦！”没想到光远先生突然大叫一声。夫人孟苏阿姨一下从内室走出来：“怎么啦怎么啦？”

看到夫人紧张的样子，先生和我都笑了起来。我赶忙说明情况，孟阿姨释然了，接着对先生说：“你不是经常参加小柳他们的活动吗，能去尽量去呗！”

结果，光远先生参加的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由于会议主题紧扣当时的舆论焦点，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了一分半钟时长进行专题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报道都用了较长篇幅，中国财经出版社还出了论文集权威人士论《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看到媒体反应如此强烈，光远先生后来诙谐地对我说：“看来，你们那次会议我参加是对了哦！”

“希望大家都是‘二表人才’”

平时赞美一个人，大家常常使用“一表人才”这个词。然而 1996 年 7 月，在光远先生 80 华诞庆祝会上，我曾亲耳聆听先生讲述“二表人才”理论。

那天，光远先生的生日宴会在亚洲大酒店举行，200 多位男女宾客齐聚一堂，其中有五十年代在先生领导下工作的老部下，有跟随他多年、领受他教诲的各届学生，以及方方面面的新老朋友。当光远先生作为老寿星出现在门口时，骤然响起的掌声足足持续了两分钟之久。先生神态安然，面带微笑，走遍大厅每一张餐桌与到场的客人握手寒暄。持续近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时时洋溢着欢声笑语。大家怀着深深的感情，用美好的语言，献上一篇又一篇祝寿词，祝这位可敬的师长康健、愉快。当司仪宣布请光远先生讲话的时候，大厅里又一次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光远先生动情地说，“今天，我很高兴。一方面是大家的到来，再一方面就是你们说了许多表扬我的话。最近我跟不少人讲，我是一位“二表人才”：一是爱表现，二是爱受表扬。并且我一点也没有感到难为情来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二表人才”。因为表现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恩格斯论人的生活：一曰生存、二曰享受、三曰发展和表现自己。发展和表现什么？无非是个性和才能。个性和才能是分不开的，只有允许个性的发展，才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发展和表现自己是继生存享受之后更高一个层次的生活需要。做真人，说真话，就不怕承认自己是爱表现的人。而且表现了也总希望得到肯定的评价。我向大家坦白：听到你们的表扬，我心里乐滋滋的。我写的东西，被评为佳作，得了奖，我也很高兴。所以爱受表扬也是人的本性，岂是



2000 年 4 月 14 日，于光远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向少先队员代表赠送《中国资源》系列丛书

否得了的？接着，他又举了许多例子，从运动员到演员、音乐家、作家、科学家，在取得成果并且得到社会肯定、赢得赞誉时，光远同志认为，这时他们就是“二表人才”。他的这番高论引发了阵阵喝彩声。先生最后祝愿大家都当“二表人才”，都是“二表人才”。

由此我想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人都成为“二表人才”，都能尽力地去展示自己的才能，那么社会进步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的。

看来，座右铭只能作为一种追求！

2000 年 4 月 14 日上午，本会组织的“全国中小学生保护资源今日行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启动仪式，王光英、赵南起、曲格平、陈洲其、关牧村等领导同志、社会名流出席。那一天活动议程很多，光远先生作为专家代表讲话。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安排，光远先生讲话时间较长，坐在先生一侧的王光英副委员长附耳光远先生说：“可否少讲点，后面还有要讲的呢！”先生立刻大声回答：“我讲得很重要！”“别人讲得也很重要啊！”二人对话之后先生又讲了大约 10 分钟。

可能王光英感觉不爽，提前离席，我起身送行。王光英副委员长拉着我的手说：“你看，这些专家很有水平也很有个性，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努力保证把会议开好。”

我回到会场，看看主席台上的光远先生，仍然脸有愠色。原来，由于路上不顺，先生来到会场时，刚刚照完大合影，我正在指挥大家有序进入会场时，先生一脸怒气地从电梯里走了出来，见了我就说：“今日行动，我就动不了！”胡秘书告诉我说是警卫不让进。我赶忙扶光远先生进入会场，然后马上派人到大会堂西门了解情况，一问才知道，九点换岗，先生的车不能直接开进大会堂，因此警卫折腾了好一会儿才放行，搞的先生很不高兴。两件事情叠加，先生的心情当然好不了。



1997 年 7 月 5 日，作者为中国“四大恶人”拍照留念：于光远（右二）、何作庥（右 3）、郭正谊（左 1）、司马南（右 1）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我总是希望会议圆圆满满，让每一个参会者高高兴兴。但是，怎样才能让光远先生高兴起来呢？我环视了一下会场，会议在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的主持下有序进行，200 多位来宾把安徽厅挤得满满的，其中有来自北京实验小学的 50 位小学生。我灵机一动，找到了带队的陈老师，问她同学们愿不愿意请于老签名照相。陈老师一听乐了：“那当然好啦，同学们当然愿意了！”“那好陈老师，会议结束时听我指挥！”

“启动仪式到此结束！”曲格平主任话音刚落，我便拿起话筒，请于老、请同学们等一等，我说：“应同学们的请求，下面于老为大家签名留念。”很快，50 位穿着校服、扎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手持我们编发的《中国资源》书本在先生面前排成一长溜。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祖国花朵，光远先生心情大开，逐一为同学们签字、合影，直到 12 点多，我送先生上车，先生笑容满面，啧啧称赞“这些孩子们，太可爱了！”

时隔两天，我又来到光远先生家看望，先生正在写文章，见我进来，立刻用铅笔敲着桌子大声说：“王光英有什么了不起，他为什么不让我讲话？”看着我诧异的样子，先生稍顿一下，扑哧笑了，招呼我坐下，指指玻璃板下，不无歉意地说：“忠勤你看，我的座右铭是生气后悔不超过 1 个小时，两天过去了，我还在为一句话生气。可见，座右铭只能作为一种追求，要做到可不容易！”我低头看玻璃板下，果然压着两张纸条，除了这一张外，还有一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理！

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理！

于光远被伪科学“大师们”评为



1996 年 10 月 12 日，于光远先生在国际俱乐部与我们谈伪科学问题

中国“四大恶人”之首。

前些年，特异功能喧嚣一时，甚至国内许多知名人物都对特异功能持肯定态度，而作为反对派，于光远是挂头牌的。为了取得科学的论据，他把特异功能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短短几年里，在国内外报刊上撰文数百篇，有理有据地对这种伪科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1995 年 10 月 12 日，光远先生应邀出席由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我们组织的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理论研讨会闭幕式，会议结束后，应大家的要求，他就此问题与我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于光远说，我之所以反对特异功能，是因为我对所谓特异功能的一些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就拿传说最普遍的耳朵认字问题来说吧，人通过眼睛之所以能够看到外界的景物，首先是因为位于眼眶前部的眼球是透光的。眼睛包括球壁和屈光系统两部分。屈光系统中的晶状体就是直径约 10 毫米、中心厚 4 毫米的弹性双凸透镜；其次，光线透过屈光系统照到眼球后壁上的网膜。网膜上有特殊的感光细胞。这种细胞的感光色素在接受光刺激后产生光化学的变化，释放出能量并激发细胞产生电变化。最后，经过联结到大脑的神经系统，把以能量为载体的信息，传到大脑皮质区枕叶处，引起视觉。只有让这样的物质过程正常地进行，才谈得上真正“看”到了什么东西。显而易见，耳朵认字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又怎么可能认什么字呢？一位朋友说，于老，我可是亲眼看到过特异功能表演的，接着举了很多例子。光远先生笑道：“你上当了，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理！任何特异功能的表演，真正起作用的都不外乎心理、物理、生理三个因素加上魔术手法。所谓外气发功治病，实际上是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名片砍筷子，只能砍断象牙、塑料的，是砍不断竹筷子的，因为竹筷子粗纤维多，所以是物理作用。而更多的是在变魔术，只不过手法更加高明，隐蔽一些罢了。

我说：“于老，张宝胜在特异功能表演方面颇有名气，我们把他请来，您到场，咱们当场看他表演一下如何？”“他不会来的。”光远先生十分自信地一挥手：“1988 年 3 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张宝胜给来京的代表和委员表演很成功，香港的先生们在和平门烤鸭店摆下两桌酒席，约请我和张宝胜当面‘较量’。我应邀前往，张宝胜答应赴宴，可到时他却不敢去，使大家等了很久，香港的朋友们很不高兴。可见他的确很怕我。不过他们倒也有他们的解释，一说，特异大师们修到了‘慧眼通’或‘法眼通’，而我于某修到了更高境界的‘佛眼通’，‘慧眼’和‘法眼’当然敌不了‘佛眼’了，一说我于某有众多信仰者，众多信徒对我的加强，走到哪，身上都要发出一个很强的信息场，而张宝胜仅是位传统气功的特异功能者，遇到强大的信息场干扰时，他无以应对，所以失败。我认为，这是作假者的自我辩解。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没有那么多子虚乌有的东西。”

在前年光远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被“大师”们诬为“中国四大恶人”的于光远、郭正谊、何祚庥、司马南与三百多名来宾齐聚一堂，于光远即兴致辞，在谈到“法轮功”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时，誓言要“与伪科学斗争一万年！”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于光远捍卫真理、宁折不弯的精神着实让人叹服。

癌细胞、白细胞、文学细胞

《癌细胞、白细胞、文学细胞》是光远先生一篇散文的题目。1992 年，于光远患了乳腺癌。经过手术，癌细胞由几十亿下降到几百万。由于化疗，白细胞降至三千以下。病中的他开始改变过去的写作路子，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病情亦相对比较稳定。于光远认为这应该

给“可爱的文学细胞”记一个大功。他还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也患了癌症的经济学家季崇威。在前年的一次会议上，季崇威对笔者说，我接受光远先生的观点，同时又加上了经济细胞、音乐细胞，睡不着觉听听音乐，一年多来感觉良好。

这些细胞之间相互抑制的个中道理且不去理论，光远先生豁达、幽默的性格可见一斑。

1996 年春节前一天晚上 8 时许，我接到光远先生电话：“忠勤，看来我要打假啦！”我听了一愣，立刻意识到上午送去的果篮出了问题。原来，那天上午，我们去给他拜年，路上花近 200 元买了个装潢漂亮的果篮。虽然觉得水果质量不那么保险，但总认为新年新岁，图个吉利，好看为上。没想到还真出了毛病。这篮子水果外面看还可以，里面尽是坏的。咱们是不是找消协去讨个说法？这帮做买卖的，你说你赚钱就赚呗，坑老百姓干什么！”听到这儿我也乐了，“于老啊，关键的关键他不知道我这篮子水果是送给您这位经济学家的，要不然他说什么也得给咱装好的。”后来听先生夫人说水果的大部分还是可以食用的，因此也就没去消协。不过从此再买水果。我可不买样子货了。

1998 年暑季一天，笔者去找光远先生办事。由于早已掌握了他午间休息的规律，我算准时间，三点半走进客厅，夫人从卧室把刚起床的于光远请了出来，我赶忙迎上前去，扶他在写字台的藤椅上坐定，光远先生扑哧一笑：“你现在来找我办事最合适不过了，我刚从睡梦中醒来，头脑还没清醒，迷迷糊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待一会儿我醒过劲儿来，可就不好说了。”几句风趣话加上他那幽默的表情把我和光远夫人、秘书都逗乐了，室内的空气一下子变得非常融洽、欢快。

就是在不断遭批斗的“文革”中，光远先生也有许多幽默的故事。一次，他自己去参加在政治学院召开的批斗他的会。到了门口，要门票，他说，“我不知道要门票，也没人给我门票。”“没门票是不能进去的！”把门人坚定不移。“没门票我也一定要进去的！”于光远当仁不让，惹来了许多围观者。把门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是，敢情没你这批斗会还开不成了咋的！”“对，没我你们就开不成！”那人一听懵了。于光远问：“你们开的什么会？”“批斗会呀！”“批斗谁呢？”“于光远呀！”“我就是于光远，你说没我你们这会开得成吗？”围观者一听就“炸”了。把门的还不信，赶紧找来会议组织者验明正身，才放行了。光远先生说，那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觉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会场，不过，进去就坐了“喷气式”飞机。



1999 年 9 月，陪同光远先生到广东开平考察。右为先生秘书胡冀燕

幽默、豁达、大度的性格不仅有益于他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给别人以极为亲切的感觉。因此在光远先生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朋友，有党政军领导，也有专家学者；有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结交的老朋友，也有像我这样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谈起于光远，都说他没有大学问家、大名人的大架子，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因此，都愿意和他交往。

我怎么不能聘请研究员？

秘书长，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党委书记，名誉理事长，无论我的哪个身份，后面都会有个“研究员”头衔，面对许多朋友敬佩的目光，我曾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我的研究员是于光远先生聘任的。

1999 年 10 月 10 日，我到于光远先生家报告工作，其间谈到，为了更好地从事国土经济学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光远先生以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聘请我为国土经济研究员。夫人孟苏一旁听了说：“研究员是个职称，你怎么可以聘请呢？”光远先生说：“我们不发工资、不要指标，只是为了工作方便，有什么不可以？再说，忠勤从事

国土经济研究多年，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做研究员没有问题嘛！”

那天，我诚惶诚恐地从先生手里接过聘任书，心里感到沉甸甸的，回想自己的工作经历，真怕有负老人家的重托。

我1971年投笔从戎，先部队、后地方，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90年才涉足国土这个领域，才知道于光远和于光远的“大国土”理论，这个研究员挂在我的头上，衬得住吗？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努力不负于光远先生的希望，践行先生的“大国土”理论，在张怀西、杜润生、王先进、江泽慧等同志领导下，我与学会各位同仁各位一道，组织理事会在国土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1990年7月，组织首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所大专院校的千余名大学生，利用暑假，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情况调查；1995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理论研讨会；1996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全国首次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经验交流会；1998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中国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1999年9月，受全国人大环资委、教育部、团中央委托，组织实施了为时三年的全国亿万中小学生保护资源教育与实践活动；2001年7月，经中国科协批准，启动了全国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实验区共建工程；2010年，启动全国低碳国土实验区共建工程；2014年，启动全国国土空间优化发展实验区共建工程；同年，启动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共建工程；2021年，启动全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实验区共建工程。2022年，在中国科协领导下，我们联合15家全国涉农学会成立乡村振兴联合体，以“‘双碳’引领下的乡村振兴”为总目标，启动乡村振兴百县千村工程，从而为推动学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学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铺就了一条阳光大道。2002年6月，《今日国土》杂志创刊，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宣传平台。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土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为了中国的发展与辉煌》《中国怎样养活养好中国人》《国土经济学通论》等理论与学术著作的相继出版，国土经济学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中国科协领导同志评价说：“中国科协两百多个全国学会，你们是最有特色、最有活力的学会！”

时至今日，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温光远先生给我的聘任书，心里有了几分踏实的感觉。从秘书长到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到理事长、党委书记，再到名誉理事长，许多朋友都称我为国土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专家，也当不了专家，我信奉并坚守的是：当不了专家，绝不能当外行。光远先生聘我当研究员的确是我的荣幸，同时也是我的压力和动力，我将时时以此鞭策自己，尽职尽责，不断学习，努力做好“国土”这篇大文章，为中国国土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3年9月30日，作者与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部分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到北京医院送别于光远先生